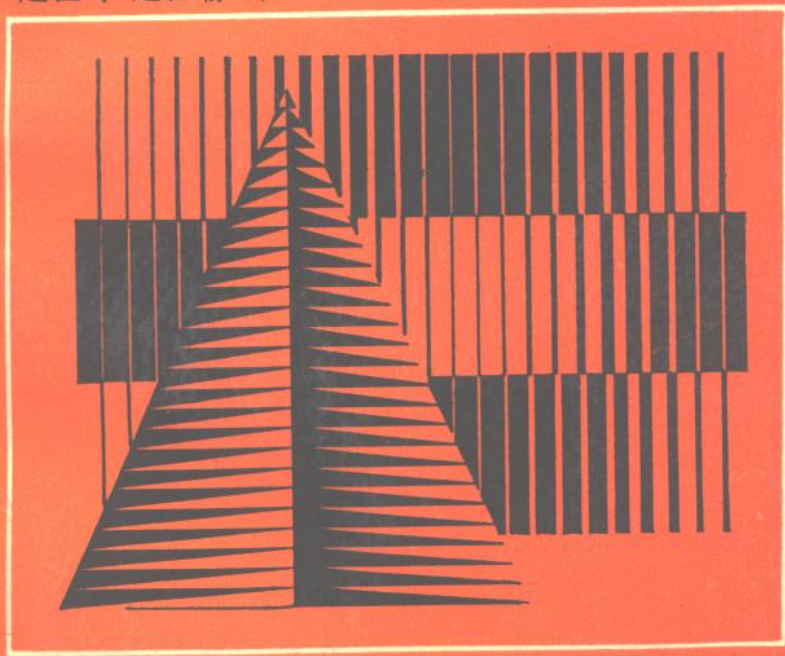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文库

欧洲史学新方向

〔美〕伊格斯尔 著
赵世玲 赵世瑜 译



华夏出版社

欧洲史学新方向

WU WENKU

〔美〕伊格尔斯 著

赵世瑜 赵世瑜 译

华夏出版社

1989年·北京

1175778

责任编辑：于沛
封面总体设计：郭力 钮初 呼波
李明 王大有
本书封面设计：徐天离

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by

Georg G. Iggers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Connecticut, U.S.A., 1984.

欧洲史学新方向

【美】格奥尔格·伊格斯 著

赵世玲 赵世瑜 译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柳芳南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8.625印张 217千字 插页2

1989年3月北京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500册

ISBN7—80053—175—9/K·021

定价 4.95元

中译本序言

历史学是不是一门科学？历史有没有客观性？历史研究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如果有的话，它是什么样的？……许许多多问题摆在各国历史学家面前，引出千变万化、五花八门的回答。美国历史学家伊格斯的这部著作，正是对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欧洲当代各史学流派所做的分析和介绍。

顾名思义，这部书是介绍近年来西方史学流派的主要史学观点和研究方法的。作者着重对法国年鉴学派、德国社会政治史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史学理论进行了评介，也涉及其他国家和史学派别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本书并不企图对当代史学作出全面评价，而是“检验几个比较重要的方向”。上面所举的三个史学方向可以说是本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影响较大的，因此可以代表西方史学发展的基本动向。

作者在评介“新方向”之前，首先回顾旧的史学传统，比如18世纪的哥廷根学派，19世纪的兰克学派等等，并说明这些学派的主要理论以及它们如何逐渐被20世纪初叶以后兴起的新史学所取代。

作者指出，上述史学新方向在理论和方法上千差万别。总的来说，法国年鉴学派主张以总的经验法则来解释历史现象，酷爱用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德国社会政治史学家们尽管也开始重视模式，强调概括，但更注重历史进程中具体的、独特的事物，主张对具有主观因素的价值及意义加以解释；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主要指当代英、法两国及波兰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往往遵循发现历史规律和注重生产

关系的原则，而且将历史视为改造客观世界的批判性武器，因此对经济关系、阶级斗争和下层人民生活状况十分重视。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方法加以修正、补充，故而其基本观念与方法同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多少有些不同。

作者又指出，尽管存在着分歧与差异，但上述各派在总的趋势上有着基本一致之处：大家都开始认识到历史学家需要从现代社会科学中汲取概念、理论和方法，开始由注重事件的研究转向对社会结构的探讨，由强调分析事物的特殊性转向揭示事物发展的普遍性，由依赖定性考察，转向凭借定量分析，由叙述体转向分析体……

当然，上述特点并不能概括各个派别的全部思想，正像作者多次指出的，每一派别中各个学者的观点方法甚至会有很大的不同。

本书根据1984年修订版译出。在前4章基本保持原貌的基础上，作者增加了“跋”，也就是第5章。在这一章中，作者探讨了70年代初至今这10年间历史研究的新发展：从依靠严格的社会科学方法转向强调难以捉摸的文化意识因素的方法。

本书还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一、避免把史学史写成一部单纯叙述人、书与思想的历史，力求在社会政治经济变化及历史教育制度和研究环境中来探讨各史学流派产生、发展、存在的根源，使史学史成为社会史及文化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例如，在论及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德国历史主义传统抵制时代政治剧变挑战的坚韧性时，作者认为，德国的大学体制及征聘制度是解释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根源。

二、力图摆脱主观性、片面性，努力对各流派进行全面公允的分析，在高度评价其成就与贡献的同时不忽略其失误与不足。例如，作者显然对年鉴派史学比较赞赏，认为它“是一个比任何别的历史学派都略胜一筹的、今天全世界历史学家进行科学性历史研究的典范。”但是他也不隐讳它的缺陷，指出它忽视对人的历史

波动进行分析，在研究中存在客观主义的、非政治化的倾向。

三、既宏观地概括出当代历史研究总的发展趋势及各个流派所代表的总方向，也具体探讨每一派别内部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不同国家中历史研究的基本特点；对富有特色的作品及有代表性的历史学家一一加以评论，在基本一致的前提下突出小的差异。

诚然，作者与中国读者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与政治观点，他不可能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研究的基础与指南。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及方法也有所批评，例如，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著作大多是为当时的政治需要而写的，缺乏其经济学所具有的概念上和方法上的严谨性；马克思对于阶级冲突的分析基本上是印象主义的，缺乏坚实的档案基础。因此，对于广大读者来说，依靠历史唯物论对本书的内容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思考显然是非常必要的。

本书作者格奥尔格·G·伊格斯生于1926年，现任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历史系教授，对欧洲史学史、思想史造诣很深。除本书外，还曾出版《德国的历史观》、《国际历史研究手册》等著作。《手册》一书曾片断译成中文并刊出。1985年夏，作者曾应邀来华，先后在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处讲学，对于我国史学界了解、借鉴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及方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张芝联

修订版前言

10年来，历史研究中出现了意义重大的重新定向。与各部门科学的联系没有中断——在许多方面还得到了加强——，但这种联系的性质则再度受到检验。历史学家们频频谈及数量化作为理解历史工具所具有的局限，同时大大强调定性的文化因素。对叙事史产生了新的兴趣，这是一种复兴，它不时直接向社会史的新形式挑战，但也经常（特别是它注意到普通男女的历史）反映以往10余年的新兴趣。

为本版所写的跋并不是详尽无遗的，毋宁说它只试图探索某些标志着过去10年中历史编纂学的方式、观点和兴趣方面的主要变化。注意力集中在法国、大不列颠和联邦德国的历史研究上；文中仅略略涉及到意大利和民主德国；总的来说，本书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研究和著作注意甚少（尽管第四章的确讨论了波兰的学术成就）。这种不平衡主要是由于我本人语言能力的限制，不是由于欧洲各个不同国家的历史研究具有不同的价值。尽管历史研究的民族传统仍然影响着整个欧洲，但成为东西方共同财富的历史研究方法越来越多，本书试图找出这些共性。

目 录

中译本序言

修订版前言

第一章 传统科学历史观的危机.....	(1)
第二章 年鉴传统——寻求一种历史科学的法国 历史学家们.....	(47)
第三章 超出“历史主义”之外——自菲舍尔争论 以来联邦德国史学中的一些发展.....	(88)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社会史	(136)
第五章 跋：对过去十年的回顾	(194)
书目提要	(231)
索引	(240)
译者后记	(267)

第一章

传统科学历史观的危机

1

纵览近50年甚至百年来有关史学思想的著作，我们对哲学家和实践历史学家评价历史编纂状况时的尖锐分歧感到震惊。在尼采^①的论文《历史的运用与滥用》发表以前，人们就不仅对历史在生活上的效用，而且对于历史成为科学的可能性日益产生疑问，这些疑问近年来使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②和米歇尔·富科^③提出人类是否有历史这样的问题。对历史的科学性的挑战最近在海登·怀特^④从语言的规范和诗的想象中寻求历史思想的超历史学基础中表现出来，这项研究不承认真正的历史学和历史哲学之间存在有意义的区别，而且将对两者孰优孰劣的选择简化为历史“完全以美学或伦理道德为基础，而不以认识论为依据。”^⑤对历史科学性的这一过于苛刻的态度并不仅仅为20世纪早期的活力

① 尼采(1844—190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主要著作有《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译注

② 列维-斯特劳斯(1908—)，法国结构主义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结构人类学》等。——译注

③ 特别参见米歇尔·富科：《字与事》(巴黎，1966)——原注

④ 米歇尔·富科(1926—)，法国历史学家。——译注

⑤ 海登·怀特(1928—)美国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历史的功用》、《人类自由主义的神裁判法》(均与人合著)等。——译注

海登·怀特：《超历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巴尔的摩，1973，第427页及XII。——原注

论者、20世纪下半叶的结构主义者所具有，而且卡尔·波普尔^①这样的逻辑实证论者也如此认为，这与近20年来显著加强了的历史研究的逐渐科学化是背道而驰的。正如海登·怀特提出的那样，也许“对历史科学化的要求仅仅表明是对历史概念化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偏爱”，^②但这种偏爱对于各种极不相同的历史学家来说都具有日益强大的魅力。

的确，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以后相当时期统治着历史学术的历史科学旧模式，近几十年来日益被视为不合适了。同样，由客观存在的历史知识、由坚持历史探索中的评价自由以及信奉历史发展连续性所构成的旧学术思想的某些设想也被认为是不合适了。与传统的实践和设想的决裂，使历史思想对历史科学能否存在，常常持怀疑态度，尽管如此，实践历史学家还是试图将历史置于更符合当代的科学概念、尤其是人文科学概念的基础之上，以便克服反映过去年代的知识趣味和社会现实的历史科学观的不足之处。

有些历史学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把历史学视为一门科学，一门由精密的方法论上的假设所指导的学科；在论及这些历史学家时，众所公认，我们将范围缩小为史学著作和史学思想的短小的断章零篇。写史的目的千差万别，写史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因此历史与神话、历史与诗歌、历史与思想之间的界限是经常变化不定的。而且，历史学家能满怀信心地写下“历史是科学，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③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历史是一门科

① 卡尔·波普尔(1902—)，英籍哲学家，主要著作有《历史主义的贫困》等。——译注

② 海登·怀特：《超历史学》，第37页。——原注

③ J·B·伯里《历史科学》，这是伯里于1902年作为剑桥现代史钦定教授的就职演讲稿。再版于弗里茨·斯特恩所编《历史的多样性》克利弗兰，1956，第201页。——原注
〔J·B·伯里(1861—1927)，英国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罗马帝国：公元前27年至公元后180年》等。——译注〕

学的说法，在英语世界中容易引起争论，因为在那儿，科学一词已经与自然科学的模式密不可分。法国和德国学者对于说历史是一门科学所持异议较少，因这种科学与精密科学不同。从利奥波德·冯·兰克^①到J·H·赫克斯特^②，这些历史学家都认为，历史的主题和方法与自然科学的截然不同，“所写的历史通常是一门这样的学科，它受到与那些科学解释、即自然科学中的解释不同的规则和措词约束”，^③这当然是正确无误的。但是，使历史学家同其它学科的学者或科学家们结合在一起的，是他们都承认，不论历史学与其他科学的探索方法和解释规则有何不同，这些方法与规则归根结底不依赖于个人的直感（不论这些直感在科学思维的过程中起什么样的作用），而是受众人可以接受的探究原则所支配。认为历史学不仅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的观点，得到了甚至兰克这样的拥护“科学”历史的人的普遍认可。^④但是，不论文学、美学和修辞学方面的考虑在历史表述中可能会多么重要，自亚里士多德以来^⑤，历史学家与哲学家就普遍认为，历史

① 利奥波德·冯·兰克(1795—1886)，德国极有影响的历史学家。由于他在1824年出版了《1494—1535年罗曼与日尔曼各族史》一书而声名大震。1841年获得“普鲁士钦定历史学家”的荣誉称号，他以研究班的教学方法，训练史学工作者，形成一个势力很大的历史学派。兰克一生著述极多，主要著作有《教皇史》、《普鲁士史新编》、《腓特烈大帝传》等，全集共54卷。——译注

② J.H.赫克斯特(1910—)美国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历史入门》、《论历史学家》等。——译注

③ J.H.赫克斯特：“历史的修辞学，”载《历史与理论》第6卷第3—13页，这里引自摘要II(1972)，第121页。——原注

④ 利奥波德·冯·兰克：“论历史科学的性质”，收于格奥尔格·G·伊格斯和康拉德·冯·莫尔特克编《历史的理论与实践》，印第安纳波利斯，1973，第33页。此文被埃贝哈德·凯赛尔以“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为题，片断发表于《历史杂志》第178卷(1954)，第290—309页。——原注

⑤ 《诗学》第9章。

在根本方法上与诗歌或小说全然不同，历史学家的任务始终是重现并解释一个真实的过去。

至少从文艺复兴以来，历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就科学一词的更广泛的含义，将历史视为一门科学，但是史学史至今还没有对此给予充分的考虑。历史编纂学史一般被写成人、书或思想的历史。它至多也不过如菲特尔^①、古治^②、巴特菲尔德^③和康恩^④的著作^⑤，力图将历史学家置于思想史或学术史的更广泛的范围之中。但直到最近，还很少把历史研究的历史作为一门在其社会和制度的范围里不断发展的学科来加以探讨。本书试图对以这种方式研究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学科做出贡献。本书还是不成体系的，而且，它们是带着这样的认识来撰写的：即认识到历史学只部分地是一门科学，认识到甚至是最迫切地要把方法论和概念的严密性引入历史研究的企图也要考虑到诸如修辞学等其他方面。它们还受到这种观念的指导：除非反映出历史写作的社会、政治和制度环境，如仅仅根据这门学科的内部发展，史学史是绝无可能为人理解的。

信心十足地撰写一门科学的历史已变得日益困难，而撰写诸

① 爱德华·菲特尔(1876—1928)，瑞士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近代历史编纂学史》等。——译注

② 乔治·P·古治(1873—1968)，英国历史学家，曾主编《剑桥英国对外政策史》并撰写《19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等著作。——译注

③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1900—?)英国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基督教与历史》，等。译——注

④ 伊戈尔·S·康恩，苏联当代学者，主要著作有《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等。——译注

⑤ 参见爱德华·菲特尔《近代历史编纂学史》(第三版，慕尼黑，1936)；乔治·P·古治《19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伦敦，1913)；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往日之人：历史学术史研究》(剑桥，1955)；伊戈尔·S·康恩《20世纪的历史哲学》(柏林，民主德国，1964)，此书为W·豪普由俄文译出。二卷本。——原注

如历史学这样一门在方法上五花八门、在解释上各执己见的历史就更是难上加难。从杜尔哥^①和孔多塞^②到奥古斯特·孔德^③、约翰·斯图亚特·密尔^④和J. B. 伯里这些18世纪和19世纪的思想家们所抱的信念已一去不复返了，他们曾设想，正是现实的结构保证了科学知识在每一主要知识领域内日益形成一种统一的理论。在从康德^⑤到现代逻辑实证主义者的科学思想中，仍然指导着19世纪大部分科学的自然客观性概念已被别的概念所取代。今天，科学哲学家们普遍同意，“科学的假设和理论并非来自观察到的事实，而是被臆造出来说明那些事实的。”^⑥这当然绝不排除可能存在证实科学理论的标准。然而，从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⑦到加斯东·巴歇拉尔^⑧和T. S. 库恩^⑨，他们那广泛而又千差万别的各种思想则强调，超科学的因素进入并共同决定科学家提出的问题和他们借以企图理解或解释事件的理论，施本格勒因而认为，包括数学在内的各门科学都是对某一特殊文化的

① A·R·J·德·杜尔哥男爵(1727—1781)，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译注

② 马尔奎·德·孔多塞(1743—1794)，法国启蒙思想家、政治活动家。——译注

③ 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著名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主要著作有《实证哲学教程》、《实证政治体系》等。——译注

④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1806—1873)，英国政治思想家。主要著作有《论自由》、《逻辑学体系》等。——译注

⑤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著名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主要著作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等。——译注

⑥ 卡尔·亨普尔：《自然科学的哲学》(新泽西，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66)，第15页。——原注

⑦ 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1880—193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主要著作有《西方的没落》等。——译注

⑧ 加斯东·巴歇拉尔(1884—1962)，法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主要著作有《科学精神的形成》。——译注

⑨ T. S. 库恩(1922—)美国科学哲学家，主要著作有《科学革命的结构》、《哥白尼学说的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等——译注

主要象征的表述^①。巴歇拉尔和富科强调，每一时代的科学为一种知识模式(*episteme*)^②所标志，它类似库恩的“范例”(paradigm)，是观察和组织一套知识的一种方式；他们还强调，科学史不以知识积累所导致的科学理论的变化为标志，而以认识论的猝然中断(“*coupures épistémologiques*”)为标志，这一中断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科学观从根本上重新定向^③。因此，科学的历史并非以连续性，而是以骤然中断为特点。从特奥多尔·莱辛^④到卡尔·波普尔^⑤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⑥，这些历史理论家们对于所有历史的时间界限和文化相对性的看法大同小异，前者认为所有的历史都是神话，后两人则各自从全然不同的观点出发，认为历史没有客体，同时，任何历史都只是对于它撰写的那个时代和文化来说才是真实可信的。

从这种观点看来，科学的历史——或者历史研究的历史——似乎缺少任何有意义的方向。它以一连串观察现实的世界观为标志，这些世界观的地位相等，无一在有条理的概念性认识上具有更大的权威。不过库恩或巴歇拉尔都很不情愿承认这一点——就历史研究来说我们也是如此。库恩与巴歇拉尔同样认为，科学的

① 参见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特别参见其第2章“数字的意义”。

——原注

② 这是富科认为存在于各种文化知识内部的一种结构。——译注

③ 参见加斯东·巴歇拉尔：《科学精神的形成》(巴黎，1938)；《新科学精神》(巴黎，1949)；《否定的哲学——论一种新科学精神的哲学》(巴黎，1949)。——原注

④ 《无理智者思想形成的历史》(慕尼黑，1921)。——原注[特奥多尔·莱辛(1872—1933)德国社会文化评论家、哲学家，曾撰写一部关于历史含义的重要的批判性著作。

——译注

⑤ 《公开社会及其敌人》(普林斯顿，1950)，第452页——原注

⑥ 《野性精神》第262页、257页；参见他的论文“历史学和人种学”，收于《结构人类学》(巴黎，1958)。——原注

历史以“范例”的“革命性”变革为标志，从而一代科学家看待其工作的整个方式发生了剧变，与之一致的科学研究新传统得以出现。与巴歇尔尔同样，库恩希望摆脱“真实”与“现实”这类概念，但与此同时，他又想逃避说他正“将科学变为主观而荒谬的事业”的指责。尽管“范例”的变化绝不恰恰由“一种所知东西的增加”而造成，但它发生在一个真实的历史环境中，当历史专业处于毫无保障的关头，在旧的方法不再足以令人信服地解决科学团体为自己提出的问题之际。对“范例”的修正不仅仅由于资料不确切，而且是因为一个更深刻的危机，这一危机包含着与更广泛的社会现实危机密不可分的“世界观”的变化。在库恩看来，科学的真理归根结蒂变成了科学团体的一致见解，而这一团体又是由“严格限定的问题和高度技术性的方法维系在一起的专家们”组成的一个特殊团体^①。正如戴维·霍林格尔所指出的，这意味着从一种具有“固定的、永恒不变的科学真理”概念的“超验的客观性”，向一种“以社会为基础的客观性”过渡^②，而后一客观性却构成了某种客观因素，这种客观因素不完全能得到科学团体的一致同意，但有助于这一团体在为它所提出的问题探求答案时取得一致意见。毋庸置疑，每一科学的革命“既有所获也有所失”，而有所失是由于新方向不再能应付某些它视野以外的问题^③。然而库恩感到必须承认，尽管范例的变化使个别科学团体蒙受了“损失”，但“这类团体的性质却提供了一种实际的保证，使科学将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而且各个问题的答案也将越来越精确”，而且，“只要这样一种事业存在，某种进步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一科学事业的特征，”这表

① T·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增订第2版，芝加哥1970），第7页、第85页、第111—135页、第167页。——原注

② 参见戴维·霍林格尔：“T·S·库恩的科学理论及其涉及历史的含义”，收于《美国历史评论》第78卷（1973）第381页——原注（戴维·霍林格尔（1941—）美国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佩里·米勒与哲学史》等。——译注）

③ 同上书，第392页。——原注

现为一种“对自然的日益详尽而精确的理解”^①。这种理解明智地放弃了终极的概念，承认科学研究的历史性，但绝不放弃现实的概念。

有人也许会争论说，库恩关于科学史的概念与史学史几无相干，历史学不是一门“科学”，或者，如果是的话，也是一门完全不同意义上的科学。后面这种看法无疑是对的。但毫无疑问，“历史学这门学科至少是一个有组织的学术研究的分支，”^②并已存在了两个世纪之久。的确，相当一部分历史写于这一有组织的学科之外，也并非总是遵循着它的规则，而且就其表述方式来说，历史学甚至在学术组织内部也比其他更重视解释的学科保持了更大得多的自由，在风格和形式上不仅听从同行们的意见，也听从有学识的读者的评论。信奉真实与理解的史学家的团体，其组织公认比一般科学团体松散得多，其内部又分为很多派别，但关于什么是合理的讨论这一点，并非没有某些共同的见解。在学科内部，历史学家有义务不仅叙述关于过去的故事，而且要叙述“能为有关的现存史料所证实的最真实可信的故事，”即J·H·赫克斯特称之为“真实法则”(reality rule)的东西，虽然这种真实除非根据一种概念体系来加以探讨，否则就毫无意义，但它却引进了一个衡量标准，这一标准使得“物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对探索、理解和尽可能真实地叙述现实的共同信念”具有意义，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一现实是“发生在过去的现实”。^③

信奉真实法则使得试图为加深了解过去而进行的对话成为可能。在历史学家中间，就历史研究中不能接受什么的问题较快达成了“消极的”一致意见。尤其是自从历史研究职业化以来，乃至

①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70页。——原注

② 霍林格尔“T.S.库恩的理论”，第378页。——原注

③ 参见J.H.赫克斯特：“历史的修辞学”，载《历史与理论》第6卷，第3—13页。——原注

更早，关于证据的原则就存在普遍的一致，这些原则与其说用来最后证实发生了什么，不如说用来决定某事不会发生。这种一致意见使历史学家具有一种共同语言和共同逻辑。正如我们将见到的，这在一定限度内已使得有可能进行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界限的、持续的对话。

然而，在历史作为一门自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博学家所从事的学术工作和作为一门学科之间是存在区别的。作为后者，不仅意识到历史的方法论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历史博学家也是如此——而且力求超越对过去的值得注意的细节进行考古学研究，达到依据令人信服的证据，对过去现实的各个方面进行更广泛的重现。但如上所述，这种“消极的”一致意见对于撰写一部试图把握事件与结构之间意义深远的联系的历史来说，显然是不够的，这样一部历史要求一种更广泛的理论框架，从而使解释成为可能。为使历史从博学变为一门以科学(*Wissenschaft*)自诩的学科，必须使批判地利用证据在更广泛的历史探索模式中占据一席之地，而这些模式提供了用以解决所提出问题的概念框架。这些模式完全由运用它们的学术团体的利益、观点和精神兴趣所左右，因而，在对证据由何构成的问题达成一致见解的基础上，能够写出千差万别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在对同一题目的解释上迥然相异，而且其基本设想、方法与风格也大相径庭。有人认为，这样会使历史概念不可能有任何发展。史学史以骤然中断为标志。人们主张，任何历史只有对于它产生于其间的信条、政党、阶级、民族或时代来说才是正确无误的。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每一史学传统反映了它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兰克那种狭隘地集中注意于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脱节的政治史，过窄地着眼于欧洲列强的外交事务，过分倚重国家文件而对其他史料不屑一顾的、“科学”的历史研究模式，不仅对于德国启蒙史学家写一部包罗万象的政治社会史的雄心壮志来说是一个倒退，而且也反映了这种研究模式产生时、19世纪早期普鲁士大学